

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40年改革开放波澜壮阔,40年党校事业发展飞速。我们清晰地看到,过往40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每一次跃升,都源于改革理论的突破,都源于思想的解放。而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背后,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在发挥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党校人队伍。正是当年校领导和教师们以勇于解放思想的政治担当出色地承担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以善于解放思想的学术水

准生动诠释了解放思想的“党校含义”,为党校的办学和教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精神动力。本报今日刊载的袁秉达文章见证了这一难忘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党校姓党这个党校工作根本原则,更加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切实做好新形势下党校工作。”党校事业正是扬帆时!

新时代是奋进者的时代! 40年党校事业大发展离不开党校前辈们解放思想、攻坚克难的勇气与

韧劲,如今,新一代党校人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固本开新,在新时代书写党校事业新辉煌。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欢迎新老党校人来稿,共话改革开放40周年。让我们细数那些流过的汗水、留下的奋斗足迹,啃过的“硬骨头”和涉过的险滩;让我们立足本职岗位,无惧艰难险阻,创造不凡业绩;让我们满怀期许,展望未来,用炽热真诚,激荡奋发向上、“忠诚、求实、开拓”的党校情怀。

邮箱:swdx308@126.com

复校之初:党校人走在解放思想的时代前列(上)

□ 袁秉达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创建于1949年6月16日,风雨兼程一路走来已近70个年头,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复校到成为闻名遐迩的思想“解放区”

上海市委党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停办,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1977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精神,上海市委党校复校。党校精英纷纷归队,荟聚新人壮大队伍。那年我27岁,奉命调入市委党校,在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成为校内屈指可数的“小字辈”。在40年前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期间,党校一时间成为闻名遐迩的思想“解放区”。校委班子和教师、学员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思想上、理论上澄清迷雾,为迎接改革开放新时期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幸运地遇到了好时光,在市委党校解放思想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倍受教育,在党的高等学府里逐步成长。

敢想、敢说、敢写、敢为

复校后,大家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夜以继日地工作,于1978年4月11日正式举办第一期干部轮训班。紧接着,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校委的带领下,富有政治敏锐性、理论功底深厚的党校教师,纷纷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大胆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积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四大教研室主任和骨干教师几乎个个敢想、敢说、敢写、敢为,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是让我崇敬的学习榜样。特别是哲学教研室冯其舜主任和高为学、邱少全、李海平等教师先后在《学习动态》和《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

很有质量、极有影响的重大理论文章,起了解放思想排头兵、先行者的引领作用。这些文章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观点科学,具有很高的理论造诣和政治定力,这也是校委组织全校教职员工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理论结晶和思想成果。其中,邱少全老师1978年9月21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实践高于理论——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文,是上海报刊和广播媒体第一次公开发表上海理论工作者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978年10月高为学老师发表论文《承认不承认实践标准是真高举与假高举的分水岭》,进一步阐明了理论、澄清了是非、划清了界限。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对该文作出批示:“这篇东西解答了人们思想上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还要继续宣传,不要讲过头话。”这一批示令人鼓舞,也扩大了上海市委党校在思想理论界的影响。1980年2月李海平老师在《文汇报》发表的《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一文,得到胡耀邦的批示:“现在真正有创造性的理论思想的论文太少。搞古董说套话的东西太多,请注意。这一篇我看还不错。”市委党校解放思想的先驱者们集中体现了党校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是我们青年教师的引路人和学习楷模。

沉浸在解放思想的熏陶和喜悦中

直到现在,在国内一些大型政论片中,编导往往还会插播一段上海市委党校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昂首阔步走在解放思想前列的珍贵历史镜头。其中包括《文汇报》的详细报道:《坚持实事求是 坚持群众路线 充分发扬民主——

上海市委党校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后来《人民日报》以《真高举和假高举的分水岭》为题,又作了专题报道。我专门辑录了这个视频加以珍藏,这是我校发展史上一段光辉历史,也是我入校之初接受的“开学第一课”。每次看到这一珍贵历史镜头,我都仿佛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当年的我承担了学员支部干事与代理班主任的工作,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参加校部和班部三天两头召开的解放思想讨论会和学习交流会,一直沉浸在解放思想的熏陶和喜悦之中,并逐步成长成熟起来。40年来,我始终以党校人走在解放思想前列而感到自豪。

思想一解放就特别有精神

党校当时能走在解放思想的前列,首先应该归功于校委班子政治思想水平高,解放思想意识强。李佐长是上海市委党校复校以后的第一任常务副校长,是1932年入党的一位老革命。他青年时代奔赴延安,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追求真理、渴望解放的天性。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时,李校长消瘦的身躯中奔涌着一腔热血,他的双眸炯炯有神,闪烁着敢于和善于解放思想的智慧之光。他本身就是一个示范者:思想一解放,人就显得特别有精神,富有激情和力量。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思想是否解放,事业能否成功,关键看当家人、关键看领导者是否带头解放思想,能否营造人人解放思想、个个奋发有为的宽松环境和良好氛围。当时校领导的治校理念和管理风格,处处体现纯洁的党性、优良的传统和崇高的品德。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有一种伟大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和感染着每个师生员工。解放思想既要有真理的推动力、思想的引领力,也要有道德感召力和人格感染力。在解

放思想的引导下,党校人 and 在校学员成长进步得特别快。

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思想解放

复校以后立马开班,来不及编写教材,马列主义经典原著就是现成的教材,也是最好的马列主义理论教科书。于是,校委组织力量编辑印制了《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学说”四个分册,近100万字。解放思想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并同“两个凡是”作斗争取得圆满胜利。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才能如虎添翼,马到功成。

在复校后的第一、第二期领导干部读书班中,我担任了班干事。我有幸与哲学教研室的沈佩英、朱伊卓两位资深教师搭档,她们像老大姐一般关心我的成长和进步,她们事实上成了我的哲学导师。无论在班部管理还是在教学活动中,我都向她们讨教如何学哲学、讲哲学、用哲学的经验和方法,交流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感悟。她们的能言善辩与男教师的文字功夫旗鼓相当,毫不逊色。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啃原著、做笔记,言必称“马哲学”,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人哲语常挂在嘴上,我也从前辈们身上学到了不少本领。

真理标准大讨论促进了马列经典理论学习,我与学员一起认真攻读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矛盾论》《实践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在学习中,我真切地体会到,哲学是聪明学、智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犹如

给了我们认识世界和观察事物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也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支撑着我们在解放思想中砥砺前行。也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能达到无私无畏的境界。

踏进党校畅所欲言

当时,在党内外和社会上有许多地方尚未沐浴解放思想的春风,极左思想的禁锢依然存在,思想僵化和半僵化情况到处都有,真正思想解放、大胆说真话的人并不多。复校后举办的第一期、第二期学习班的学员,主要是“文革”期间被打倒的老干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官复原职”来党校参加学习培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胆怯不敢说话在所难免。不少学员在自己单位心有余悸不敢说,一踏进党校畅所欲言真敢讲。因为,党校提倡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校委领导在大会小会上反复明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我们工作人员在参加学员小组讨论或大会交流时不做书面记录,让学员放心放松大胆说话,不必担心“秋后算帐”。一时间,大家都成了“解放牌”、“实事求是派”。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思想解放了什么问题都敢想敢说。有些学员一回到单位便兴奋而激动地对同事大谈党校学习收获和解放思想体会,同事们听得一愣一愣的,惊诧解放思想竟能如此神奇地激发活力、改变人生!

在党校学习、工作和生活,我们特别有安全感和幸福感。我们在学习和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基础上,增强了解放思想的理论底气和政治勇气,使解放思想不仅有方向感和科学性,更有坚定性和自觉性。

(未完待续)